〔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〕

十八世纪中国的成就、局限与时代特征

戴　逸

十八世纪的中国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，但范围很大，问题很复杂。我想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看法：一、十八世纪是一个继承和总结的时代；二、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到高峰的时代；三、十八世纪是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。

一、十八世纪是一个继承和总结的时代

十八世纪继承了十七世纪、十六世纪、十五世纪，继承了以往的历史。本来一切历史都有继承性，每个时代，它的制度、政策、思想、环境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各自历史的延续，就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时代，也是在原来的历史基础上建立、发展的。继承性、连续性，这是一切历史的共同特点。清朝先祖不是汉族，但它继承接受汉族文化比任何少数民族都快。它迅速地汉化，保证建立起了巩固的统治，它的统治比以往少数民族的统治更要巩固，时间更长，比起北魏、前秦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这些政权，都要巩固。为什么它的统治更长更巩固，因为它的汉化比较彻底，汉化彻底意味着采用了最适合于汉族情况的一些制度、政策，因此它的统治最有效。它迅速地汉化，也很快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，完全同化于汉族。十八世纪也是满族融合于汉族的时代，尽管皇帝要保持国语骑射等，但实际上保持不住，所以清承明制，这是一个特点，也就是历史的继承性。从政治制度上来讲，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内阁、六部，当然也有所发展，增加了军机处、理藩院。

从军事上说，绿营继承了明代兵制，八旗兵是它的民族特点，是独创的。财政政策上、也是明代的继承和完成。

十八世纪是继承的时代，也是总结的时代。总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；一方面是改进、完善、综合，清朝比起以往历朝历代，其政治体制，经济政策更加完善。就政治体制讲，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继承来的，汉唐宋明都是专制主义，但汉唐宋明的封建专制制度有很多弊端，外戚、母后、宦官、藩镇、朋党，哪朝哪代都闹得一塌糊涂。唯有清朝，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，减少到最轻、最低限度。当然也不是没有，但外戚、母后、宦官、藩镇、朋党等矛盾比前朝要缓和得多，不象明朝朋党、宦官酿成亡国之灾。清朝把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改进了，更加完善，所以它是一个总结、综合的时代，是一个改进和完善的时代。另方面，又没有突破原来封建体制的框框，尽管弊端比较少，但仍然在专制集权的老框框之内，没有本质上的改变，没有很大的创新。像文学上、我们说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明代的戏剧小说等，而清代在哪一方面都有成就很高的作品。清诗是不错的，但赶不上唐诗，戏剧也有几部代表作；清词也可以；小说中《红楼梦》更是伟大的作品。但清代文学缺少自己的特色。总的说，这个世纪是个继承总结的时代。没有创造出新的文学体裁。有人说：和世界相比，中国古代的文明是光辉灿烂的，站

在世界的前列，但到明清时落后了。因此，中国造成停滞落后的责任就在明清两代，特别是清代，所以，十八世纪是个落后的时代。这种说法不一定合适，把历史简单化了。好象接力赛跑，四人一组接力，前三人都跑在领先地位，到第四圈落后了，第四圈的运动员应该负责任。可是历史的发展和接力赛跑是不一样的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前后四个人组成一个集体，他们各自发挥赛跑的能力，他们是不相关连的，这种竞跑的能力来自每个人的能力，每个人的天赋，每个人的锻炼，每个人的临场发挥，而他们之间是无关的。第一个人不能对第二人负责，第一人跑得快，第二人跑得慢，跑得快的不能对跑得慢的负责。但历史发展不一样，历史发展前后有继承性，每个朝代促进发展或阻碍发展的机制，不是每个朝代的天性，不是每个朝代自己形成的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前一代继承来的，在继承好的东西的同时，也继承了不好的东西。清朝有许多愚昧落后的东西，形成某种制度、政策、某种思想，它有历史发展的过程。当然十八世纪的人物要对自己的时代负责，对十八世纪历史的落后负责，但是这个责任又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，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在现成的环境之下成长，他们的思想能力、行为是在前一代形成的文化氛围中获得的。在这里，历史是前后相联系的，是不可分割的。我们可以对跑接力的四个人的能力分别进行评价，但是历史朝代就不一样了。你不能把前后的历史分割开，任何制度、思想、政策都有它的渊源，可能在前一段这些因素还没有充分显露，还觉察不出来，到后面显露了，但它的根苗在前一代就伏下了。因此，整个历史是个系统工程，相互联系，前后继承，不是孤立地存在。前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，也许蕴育着后来的衰败和没落，你看它光辉灿烂，也许它本身就已包含着衰落的机制，而后一代弊端的根源，往往要到前面去追溯。电视剧中有一个插曲，歌词中有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”历史的发展有点像这种情况。前一代孕育着后一代的某些因素，而后一代显示出前一代的潜在特征。接力赛跑的评论不能运用于历史的发展。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十八世纪的人辩护。十八世纪的人当然要对这段历史负责，就象我们要对我们的时代负责。中国社会的停滞和落后，不能单独由十八世纪的人来负责，而应该从整个中国历史文明中寻找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，既有它光辉的青春期，也有它的停滞期。

二、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到高峰的时代

中国的十八世纪是历史发展的高峰。中国历史有几个高峰，象春秋战国、汉朝、唐朝、明朝、清朝。十八世纪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，这个高峰时期绝不比其他高峰逊色。怎样来衡量评估这个高峰呢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农业生产力，在农业社会里，应该说农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。过去有一种说法，是清代的农业没有什么发展，仍然是小农经济。它的农具、耕作技术，几千年没变样，和汉唐差不多。这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看了乾隆朝编的《授时通考》，农具、农业技术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，没有重大的进步。但还有另面，在其他方面进步很大，至少农业产量大大地提高了，如何来衡量，大家公认十八世纪的人口发展是高峰，从记录的数字来看，汉唐、明都没有超过七千万。（实际上宋明可能达到一亿。）可是清朝在十八世纪末即乾隆末期到了三万万人口，这是比较确切的统计。十九世纪到了四亿，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解放时都说四万万同胞，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，远远超过任何时代，超过好几倍。养活这样多的人口，就要相应有这么多粮食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因此，十八世纪的粮食产量应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。这个结论是肯定无疑的。十八世纪粮食

产量有多少，估算特别复杂。土地计算不一样，有的算亩，有的算晌，有的算石；度量衡不统一，粮食的计量单位也不同，有的用斗，有的用斤；各地方种的粮食也不一样，有的是玉米、有的是大米，有的是小麦；因此，土地数目、粮食产量没有一个统一的、准确的数字，研究十八世纪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。为什么十八世纪能够养活这么多人？当时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？能不能有一种特殊的办法、特殊的手段进行估测，用一种典型地区统计的办法来估算，我们需要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粮食产量的方法，这是有待解决的课题，关键要设计一种合理的方法来估计全国粮食产量。但有一点肯定，十八世纪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达到最高水平，而且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，人口超过三四倍，粮食不超过三四倍怎么能行？怎么能养活这些人？当然人口多是一个负担，一直到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国情。但人口多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程度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十八世纪历史是发展高峰，粮食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清代的农具如犁、锄、耙、水车并无显著的改进，耕作技术亦无重大的突破，何以能养活三、四亿人口？人口比前代增长很多。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：(1)清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。(2)清朝很重视水利工程，不惜大量帑银，全力以赴，改善了灌溉条件。(3)耕地面积增加，边疆地区开发垦荒。但究竟十八世纪有多少耕地，不很清楚，有一些数字我抱怀疑态度。乾隆末年耕地面积近八亿亩，这个数字有矛盾，因明末崇祯时已有耕地八亿亩，在乾隆盛世时应该很高了，反而没增加。到了光绪年间增加了一亿亩，共九亿亩 。光绪年间到民国，忽然增加了五亿亩，达到了十四亿亩，五十年间增加了五亿亩。前边应该增加的时候，一百年之久没增加，后面尽赶上了乱世动荡，反而增加了五亿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人口增长，投入的劳动量增多，更能够精耕细作。投入的劳动量很多，当然相应得到的报酬不一定多，不能成比例增长，但投入的劳动量多，收获量总会增多一些。(4)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是高产作物的推广，种白薯和玉米。十八世纪大量推广了白薯、玉米的耕种，它的产量成几倍地增长，能够养活的人越来越多。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人口没有越过七千万人口，一下子达到了三亿人口？我想高产作物的推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而这个推广是很艰难的，不是容易的。

还有外国大米输入中国，都说明十八世纪能养活这么多人的原因，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。从农业生产来看十八世纪，可以说是历史上发展到了一个高峰。(至少是高峰之一。)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城市的发展、政治的统一，也是重要的标志。十八世纪我国多民族的统一达到了高峰，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。我们说中国早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汉朝那时的统一是军事统治，西域还有三十六国，每个政权都是一个独立王国。张骞通西域是通到那里，还不能把该地置于中央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，改成郡县，而且时间也很短。汉武帝、昭帝、宣帝、元帝几个皇帝以后就完了。几十年，西域又不统一了，统一的程度相当脆弱，中央的号令并不能贯彻下去，汉唐如此。版图最大的是元朝，但分成四大汗国，分别统治。清朝可不一样了，清政府或改成郡县或设立将军、办事大臣，这都是中央行政管辖能达到的范围，时间也长得多。咱们是多民族的国家，如果没有清朝，中国还不知是什么样呢？这一点是清朝很大的功绩，很大的贡献。从政治统一说，十八世纪是政治统治发展的高峰。当然也还可以从各方面来看，也可以从文化思想上看，十八世纪清朝文化特色不很明显。但它产生过象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工程，也产生过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聊斋》等这样高水平的小说，也产生过许多很杰出的诗人、词人、散文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当然文化方面十八世纪也有其阴暗的方面，象文字狱，但确实有他的成就，总之，十八世纪是发展到了个高峰时代，至少是中国历史上几个高峰之一，这是从历史的纵向来比较，与前代来比较和古代来比较，说明它

还不是一个黑暗停滞时代。但是如果转换了视角、改变了参照系，如果和十八世纪的世界相比较，就不行了。十八世纪的世界发生了五个方面的大事情：

1. 产业革命：以瓦特发明蒸气机为代表，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，现代工业蓬勃兴起，代替了手工工场，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2. 法国大革命：一七八九年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，推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，横扫了欧洲的封建势力。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，中国没发生这种革命，中国是个太平盛世。法国大革命时、正好是乾隆皇帝祝寿，八十寿辰，正是封建制巩固时期，不是封建制度的崩溃时期。

3. 美国独立：英美战争，华盛顿当选第一任总统，制定美国宪法，发表人权宣言。

4. 思想界的启蒙运动：一系列思想家正如群星灿烂，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卢梭、狄德罗、亚当斯密、康德等思想家的诞生，建立了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——反封建、反教会的思想体系。

5. 科学成就：牛顿体系的确立、数学、化学方面的成就、电的发现、植物分类学、地质学等各方面的发展。

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一比，确实不行，黯然失色。这五个方面使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变化一日千里。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与这些成绩相比，中国是大大落后了。

三、十八世纪是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

先从矛盾谈起，判断一个朝代，首先要抓住它的矛盾，十八世纪有三个矛盾，第一对是阶级矛盾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，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；第二对是新旧矛盾，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主义的矛盾；第三对是中外矛盾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入侵中国。这三对矛盾都存在着。十八世纪的阶级矛盾，从缓和走向尖锐化，逐步在激化。开始是抗租、抗粮、闹赈、罢市或地下活动，组织秘密结社、秘密宗教，逐步走向对抗，以后发展到大规模的冲突。一直到十八世纪末，发生白莲教起义，一直到下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，也是这个基本矛盾的延续。

这个矛盾是主要的。这个矛盾制约着、影响着其他矛盾；制约着、影响着十八世纪的人物思想，制约着、影响着清朝的政策、措施。研究十八世纪的历史不能忘记这样一对矛盾。一七七四年(乾隆三十九年)的王伦起义，是一个信号，这次起义规模不大，时间也不长，比较快被扑灭了，但它是从平静走向不平静的信号。这次起义有三个特点：(1)靠近北京，在运河线上，经济大动脉，对清政府的威胁极大。(2)汉族起义。十八世纪规模较大的起义都是少数民族起义，苗民起义、新疆维吾尔族起义等等。十八世纪民族之间冲突较厉害，多发生在边远地区，而王伦起义是汉族在中心地区的反抗斗争。(3)利用秘密宗教起义有二类，一类是利用秘密宗教，另一类是不利用秘密宗教。象李自成起义就不利用宗教，是流民起义。但到十八世纪以后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利用秘密宗教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结合成为普遍形式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清朝由盛转衰，面临着这样的转变。

第二点是新旧矛盾。当时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，比明朝高了。我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，资本主义萌芽只不过是海洋中的几个小岛，沙漠中的几块绿洲，不能估计太高。新的经济还不能形成自己的代表，力量还很微弱。

当时的大商人依附于封建政权，官府和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商人必须依靠官府，成为垄断性的商人，如行商、盐商等。没有与政府相抗衡的意识和力量。尽管商品经济有一定

的发展，也有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，但看不到商人、手工业者独立的政治活动，比明末的情况还要差些。而当时在欧洲，已形成第三等级，包括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在内。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国王、教会，反对封建领主。要求发展，要求保障自己的利益。但中国的第三等级在哪里？当时还没有明显地形成这种力量。也有人认为有市民，但我觉得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势力，太软弱，不能和政府分庭抗礼。象苏州的布商，当织匠罢工的时候，商人们恰恰站在政府一边，和政府共同来镇压工人，而不是与工人站在一起。中国的商人包括手工业主在内，其发育程度不能估计过高。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性、多样性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，不能用长江三角州、珠江三角州 这些少数发达地区来代表全国的发展程度。十八世纪广大的腹地、山区、边疆是什么情况呢？经济文化处在十分落后状况，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，所以我主张研究区域经济，中国地区广大，发展不平衡，要对各个地区区别对待。新旧矛盾决定旧社会要向新时代跨进，当然新的因素不够强大，因此，就预先决定了向新时代跨进的困难，跨进的阻力，跨进的艰巨。

第三点是中外矛盾。从十六世纪以来，中国和外国的交往多了。西方的势力象把钳子从东南与西北，从海上与陆地两个方面箝住中国。海上有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法国连续到中国来，陆上有俄国，交往过程中冲突也是很激烈的，也有和平的交往——传教士，贸易等；也有冲突、占领土地发生战争。十七世纪就有两场战争，一场是台湾战争，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，一场是黑龙江雅克萨战争，康熙遏制住了沙俄向中国的扩张。

到了十八世纪，中外矛盾还在继续发展，但相对而言，比较平静，中外关系转向贸易，海上中英贸易，陆上的中俄贸易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没有发生，同时传教活动也停止了，文化交流陷于停顿。

从以上三种矛盾来看，十八世纪正是酝酿变化的时代，清代的繁荣盛世，在这些矛盾的影响下，正趋向衰落，新的经济已经存在，新的东西已经萌芽，但还不能起重大作用，世界的潮流正在向中国冲击，在这样矛盾中，中国的历史命运会怎样，中国向何处去？这个命题是永恒的命题，既新鲜又古老，每个时代有“向何处去”的问题，中国十八世纪之后会走到那里去。这个问题历史已作了答复，清朝衰落，没有向新时代跨进，它面临着变革，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社会，也没有主动开放，而是被动挨打，被人家把大门打开了，沦为半殖民地，经历了一条非常艰难、非常悲惨的道路。那么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，十八——十九世纪的发展，是否是必然的，中国是不是一定要沦为殖民地半殖地，悲惨的命运能否避免，能否减轻，中国能否在十八世纪前进得快一点，能否改善自己的地位，历史发展有没有第二种可能性，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思考的。当然，历史发展有它的必然规律。中国的停滞落后，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，走上半殖民地社会都有深刻的内部原因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是必然的，但必然性不同于宿命论。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都可以选择奋发自己的道路。历史不会抛弃弱者，历史曾经给所有的人提供过追赶潮流的机会，问题在于你能否认清形势，能否急起直追，是发奋图强、奋起直追呢？还是无所作为，甘心落伍。两种态度就有两种不同的结果，所以历史既是必然的，而人们又有选择的可能，所谓必然，就是指人们的历史创造受到环境、条件的制约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创造历史，客观历史提供了一个范围，人们只能在此范围内活动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。十八世纪的人，不能要求他做十九世纪的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十九世纪的人也不可能做二十世纪的事，历史提供的舞台有一定的范围，这是历史的必然性，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但历史仍有选择的可能性，在必然性范围之内，有多种的可能性选择，看你选择那种可能性。人的主观努力，人的聪明才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努力

可以对历史有一定改变。

因此，中国向何处去，这要决定于两方面，一个方面是要看客观条件。十八世纪的国情，国家的基本情况怎样，新的矛盾达到什么程度，外国冲击达到什么程度，十八世纪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。另方面，还决定于人们努力的程度。人们的行动、人们的素质，以及政府的决策、措施等等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。十八世纪的历史表面上是平静的，但是下面潜伏着强大的暗流，大变化即将来临，另方面要看到经济体制、传统的力量，传统的心理很顽强，新的事物很幼小，这里预示着十九世纪道路的坎坷不平；还有要看到变革前夕，变革中通常会出现的选择的可能性，出现机会、机遇。十八世纪的历史也是给人们提供了多次的机遇、多次的机会，让人们去追赶历史的潮流。但是总的说来，当时人们对此不关心，无认识，对外来的挑战，新事物的发生，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机会，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，传播西方文化，这应该说是中国了解世界，学习西方的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而且当时也一度发生了西方热，象徐光启、李之藻等，包括康熙皇帝都热心学习西方文化。但反对力量也很强大，阻力非常大。到十八世纪文化的西方热冷却下来了。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发生冲突。为礼仪问题，禁止传教。这种政策究竟正确不正确，其得失利弊，有待我们研究。但我们放在大的背景来看，到乾隆年间，中英贸易发展很快，当时面临着开放还是封闭，这样的选择，也是给清朝提供一次机会。是主动开放通商，还是限制、禁止，当时乾隆皇帝有一度考虑通商，而且下达了谕旨，表明了他的想法，把厦门打开，或把宁波打开，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，只开广州一口通商。乾隆末年，马戛尔尼使团来了。这也是加强东西方关系接触的一个机会。马戛尔尼带了七百多人，来中国乘好几艘船，装满了科学仪器，他要显示英国科学文明的发达。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交往，在力量对比上，英国还不可能把他的意志强加到中国身上，不可能出兵打中国。因此，交往只能是和平的、对等的交往。谈不上战争，这又是历史提供的一次机会。清政府错过了这样一个机遇，仍然是封闭。不了解外国国情，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和危机，缺乏一种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。这种机会常常是多样的、一系列的。当然，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遇上某次机会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，而应是一种连续性的努力。在一系列历史机遇中间，要不断努力，不断抓住机会，历史的前进并不是靠人的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要经历许多世代，连续不断地奋斗。评价一个民族的性格，评价一个政府的行为，并不是根据一件事情、一个方面、一次努力，而是要根据大量的、多方面的、一贯的行为，以及这些行为的长远的效果。所以在对外关系上，十八世纪出现了许多次机会，但清政府没有抓住它。

（根据讲话录音稿整理）